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

(一九九三年度)

黄国政 金家滋

赵秀英 张 莉

陆红妹 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的论文，每年数以千计。这些论文分载于各类刊物中。由于目前全国发行的刊物数量很大，发行的渠道又各不相同（有的公开发行，有的自办发行，有的是内部刊物），就一地、一单位而言，若要见到所有有关刊物，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单位不可能全部订阅，也不可能期期不缺。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即便是能见到所有刊物，面对如此大的量，一期期去翻阅，一篇篇去查找，耗时费力，亦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

我所图书资料室每年都订阅大量专业刊物。在编辑此《汇编》过程中，我们除翻阅了本所所藏刊物外，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当年度社会科学的有关刊物，并参考了其它单位收藏的刊物。

编此《汇编》的主要难点在于确定选文范围。这实际上要求回答“什么是民族史？”“民族史都包括哪些范畴？”等问题。这本是一个较大的科研课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获统一认识。当然，核心问题比较清楚，其边沿问题，特别是与相邻学科的交叉问题实难把握。诸如，民族史与民族学、民族古代文学、民族古文字、民族古籍、民族地区考古等文章的区分与归类；民族史与地区史（如新疆史、云南史、台湾史、东北史等）、边疆史、朝代史（如辽金史、元史、清史等）的划分与界定等，都是难于断然确言的。为了确保本《汇编》的内在质量，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汇编》的编选原则。

本《汇编》分卷主要以民族，一般以民族发源地为标准。如蒙古族、满族虽曾统一全国，仍按其民族分别归入北方卷和东北卷；再如西辽，按地域应入西北卷，但我们仍按其民族（契丹）归入东北卷。

类此，讨论云南蒙古族和西蒙古的文章皆归北方卷。羌族问题比较复杂，古羌的活动重心虽在西北，然其活动大范围仍包括西南地区，鉴于今羌活动中心在西南地区的情况，故将讨论羌族的文章全归入西南卷，以便集中查找。有关东夷等文章附入东北卷后。

鉴于研究北方民族文章量很大的情况，考虑到读者查找方便，本《汇编》将整个北方分订为东北、西北、北方三卷。这里的“北方”是指生息于蒙古高原一带的民族，如匈奴、柔然、蒙古族等，而综合研究三北民族的文章则收入综合卷。

为扩大读者视野，本《汇编》还酌情收了港台刊物的研究文章。由于共知的原因，这些文章在观点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一并印出，仅供研究工作参考，特作说明。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不详尽占有资料，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为了科研工作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1992年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又与读者见面了。

本《汇编》采用原文静电复印汇集装订形式，按年度分卷汇编，本年度分为七卷：综合卷、北方卷、东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东南卷、西藏卷。各卷再依文章多寡分册装订。

在我们编选的过程中，曾得到于宝麟、刘凤翥、任一飞、杨绍猷、祝启源、黄庭辉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业务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本《汇编》一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经便在下年度的编辑过程中改正。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编委会

凡 例

一、本《汇编》是为研究与教学人员提供的基本资料，收录范围包括对民族源流的探讨和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二、“民族”区别于“地域”。诸如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台湾”、“东北”、“西北”等主要从地区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其中内容重点谈论民族的则酌情收录。

三、对在全国建立王朝的民族政权（如元、清），一般问题作朝代史处理，本《汇编》只收其中有关民族的文章。

四、关于民族古代文学与古文字的文章，如主要从文学角度分析或单纯的文字解读一般不收，如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民族史实和民族历史人物，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民族史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五、涉及民族古籍（例如《蒙鞑备录》、《契丹国志》、《高丽史》、《南诏野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清实录》等等），包括民族文字古籍（如《西南彝志》、《满文老档》、《福乐智慧》、《格萨尔王传》等等），如从语言文字或文学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如从历史或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考据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六、一般考证地名沿革的文章不收，如对民族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则收。

七、关于民族地区考古文章，如单纯从考古角度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一般不收，如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民族历史问题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八、鉴于文章量过大，受经济条件限制，本《汇编》决定重点收录研究性文章。对于一般性的书刊介绍（尤其是广告式的介绍）、会议报导（尤其是新闻式的报导），以及宣传普及性的介绍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学术性强的书评，以及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研究综述等酌情收录。

九、港台文章因是竖排，为装订方便，皆在各册之后。

目 录 (一)

略谈山戎	张秀荣 (1)
关于山戎族几个问题研究的情况	张秀荣 (4)
夏商时期的氐羌	陈连升 (7)
西汉名将赵充国在处理西羌问题 上的杰出表现	杨继忠 (11)
古羌—蜀人的虎—鱼—蚕崇拜	屈小强 (17)
唐代白狗羌探考	史 林 (25)
《齐民要术》记载的羌胡饮食	吕一飞 (32)
东汉与西域关系述考(一)	余太山 (38)
西域之旅	叶 蓁 蓁 (59)
西域的历史沿革及归属	张家连 (83)
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和 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	李大龙 (88)
关于西域回回炮及其东传的研究	吕一然 (92)
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	黄时鉴 (99)
试论西域岩画的文化功能	陈冬季 (104)
张骞西使新考	余太山 (111)
丝路古道上的诸民族	(德) 汉斯—乔基姆 (118)
克利姆凯特	
赵崇民等译	
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	荣新江 (129)
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韩雪昆 (137)
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	刘迎胜 (142)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 的早期传播与杨增新的对策	陈 超 (157)

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研究概述	沈颂金 (163)
古代于阗和吐蕃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殷 晴 (168)
汉魏于阗王统考	孟凡人 (178)
大宝于阗王李圣天	衡 之 (188)
于阗文写本的历史重要性	埃默瑞克 (189)

张晓迪等译

龟兹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马苏坤 (194)
文化交流与龟兹古国	黄曾恒 (196)
论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作用	朱英荣 (208)
龟兹佛教僧团对龟兹的社会影响	朱新光 (216)
试论吐火罗期坦和吐火罗人	海比布拉·霍加 (220)

哈米提

新出麹氏高昌历史试析	柳洪亮 (225)
关于麹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	孟宪实 (233)
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	王新民 (240)
麹氏高昌时代粟特文买卖	

女奴隶文书	(日)吉田本、森安孝夫 (244)
-------	-------------------

新疆博物馆合著

柳洪亮译

试论唐朝在高昌推行州县制的历史

与文化基础	孟宪实 (252)
再论4—6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	侯 灿 (262)
高昌石窟碳14-测定数据570试析	柳洪亮 (271)
吐鲁番出土张氏高昌时期文物三题	王 素 (281)
高昌建昌六年(560)麹愔墓表考补	侯 灿 (289)
初寻高昌摩民寺的踪迹	晁华山 (293)

回鹘文书所见高昌回鹘王国的纸钞

与金属币 ····· 杨富学 (304)

高昌回鹘研究概述 ····· 刘戈 (307)

五凉史学家考 ····· 赵荧 (316)

西夏：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王国

——兼论史与治史 ····· 宋耀良 (320)

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

的地位 ····· 韩小忙 (323)

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 ····· 刘玉权 (330)

西夏《天盛律令》略论 ····· 史金波 (342)

西夏兵书《贞观玉镜将》 ····· 陈炳应 (351)

西夏后妃制度考述 ····· 顾吉辰 (358)

试论西夏建都兴庆府 ····· 杜建录 (365)

西夏沿边堡寨述论 ····· 杜建录 (370)

西夏重镇黑山城址考 ····· 宋耀良 (375)

西夏地区古盐资源考辨

——兼论若干宁甘古盐池的位置 ····· 郭正忠 (380)

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及其强盛 ····· 钱伯泉 (387)

五代辽宋时期常项部落的分布 ····· 汤开建 (399)

党项“弭药”与四川西夏遗民 ····· 周群华 (424)

突厥回纥史中的几个问题 ····· 场圣敏 (432)

东突厥、回纥与唐朝关系再比较 ····· 崔明德 (440)

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期族源 ····· 徐庭云 (448)

唐初两位突厥族驸马 ····· 厉平 (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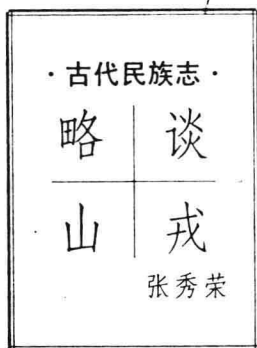
突厥人的音乐歌舞艺术 ····· 吴景山 (457)

回纥人的社会发展与宗教的演变 ····· 场圣敏 (462)

回纥汗国与唐朝的关系 ····· 马国荣 (470)

甘州回鹘成立史论	荣新江 (476)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	荣新江 (484)
七件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	牛汝极 (497)
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	梅村坦著、杨富学译 (507)
《福乐智慧》与古代维吾尔医学	夏雷鸣 (518)
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与其气质类型刍议	李晓霞 (528)
台湾的维吾尔研究	牛汝极 (533)
维吾尔族姓名初探	王梅堂 (538)
论清代维吾尔农民对新疆的土地开发	齐清顺 (545)
阿里·法拉比时代的丝绸之路及中国 与哈萨克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李明伟 (553)
清代塔尔巴哈台卡伦线和哈萨克 游牧民	(日)佐口透、李大龙译 (557)
从《黄鹂歌》看今日哈萨克民食民俗	周建新 (566)
塔塔尔族在近代新疆经济文化 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周泓 (572)
柯尔克孜图腾文化的内涵及嬗变	张彦平 (576)
裕固族社会制度的特征	高自厚 (586)
撒拉族社会组织——“工”之初探	韩中义 (595)
伊斯兰苏非文学在我国东乡族中的 变异和发展	马自祥 (601)
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 ——也谈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下)	马虎成 (611)
保安族教育史略	李燕青 (624)
关于“回回”最早出现于西夏问题的补证	汤开建 (631)
回族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丁毅 (632)
浅涉回族史学的断想	李佩伦 (636)

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	杨志玖 (645)
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续)	杨志玖 (656)
回族姓氏初探	李 仁 (674)
杨光先回族(或回教徒)问题质疑	陈 静 (683)
马联升“爱抚”浅议	金少萍 (688)
《中国回回历法辑丛》导言	马明达、陈 静 (693)
《天方性理》所反映出的回回宇宙观	陈久金 (708)
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	杨志玖 (714)
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	杨志玖 (726)
清代西北回民起义和中亚东甘人	王宗维 (739)
试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的策略问题 . .	张霞光 (752)
陕甘回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张应超 (757)
陕甘回民起义档案资料七件	马寿千 (763)
陕甘回民起义档案资料三件	马寿千 (768)



山戎又称无终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以山林狩猎、高山放牧为业。中原华族当时统称北方的民族为“戎”，因为他们山行山居，又在山中生活，故称“山戎”。

据古文献记载，山戎在夏王朝时就已存在。《史记·五帝本纪》云：“尧之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史记·匈奴列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

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逸周书·王会篇》中也提到周初北方有山戎。近年来在河北省北部及北京市北部山区发现了山戎族墓葬，这些文献记载和墓葬的发掘，为我们研究这一古老的民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山戎族的存在，在夏、周时期都有文字记载，而在商代却是一个空白，这也是一个谜，一个民族上下都见于文献，中段消失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被其他名称所代替而将原名掩盖了。孙森《夏商史稿》书中谈到在商代曾有一个奚族，居于东北地区，与商朝有过往来，并向商贡过白马和牛。甲骨文有“奚奴”之称，是因该族被俘为奴而得名的。孙先生认为商代之奚与后世南北朝和唐代之奚是同一民族的延续。王玲在《辽代奚族考略》一文中，认为唐、五代、辽时之奚，地处在燕山之北及今内蒙古的东南部。而唐代有东西两部奚，东部奚是在今河北承德和内蒙古赤峰的南部，西部奚是在今张家口及北京延庆地区。历史上，山戎活动的地区恰恰与王玲所讲奚族活动的区域相一致，这种巧合应该说不是偶然的。它为我们追溯山戎族在商代的情况提供了线索。另外，山戎与奚在生活习俗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山戎人很早就会制车，奚人也善于制车。在唐时，双方作战，唐一次就获得奚人二百辆车。在经济形态上，山戎与奚也相同，均为混合型的经济形态。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地理环境所致。燕山南北及军都山以西，多属低山丘陵地区，这些地方有山、有水、也有盆地，自然环境

好。森林深处可以狩猎，山林又可以采集，山间盆地水美草肥，可以放牧，沿河地带土地湿润，可种植易种易收的农作物。有关文献记载，山戎人善于种戎菽和冬葱。所谓戎菽，就是蚕豆。冬葱即我们现在食用的大葱。由此得知，山戎人在高山放牧及山林采集的同时，还进行部分的种植业，确属一个混合型经济形态的民族。而文献记载奚人既能畜牧和狩猎，也会种黍稷，春天播种，任其生长，待到秋天时去收获，窖藏于山下，到冬春之节缺食之时，掏去黍皮，用瓦鼎煮熟，杂冷水而食之。山戎与奚族在地域上两者相附，习俗上也相似，他们在历史上必然有联系。我们是否可作出这样一个大胆推断：山戎在夏代已经存在，商代称奚，周时又恢复山戎之名。

山戎在春秋时期曾强大活跃一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可见，山戎的势力在春秋之际确实非常强大，并对他国造成威胁。为躲避山戎的侵袭，燕国就忍痛放弃了经营近三百年的琉璃河国都，迁徙到东南方的临于易水附近的雄县、容城一带。此外，山戎人还越过燕、蓟，渡过黄河去攻打齐国。到了战国末期，山戎经常遭到使用铁制兵器的燕、齐等国的讨伐，这样，曾因以青铜短剑为武器而扬威一时的山戎族，失去了以往的强大，以至不能独立。溃散后的山戎族，可能一部分窜向蒙古草原，一部分与相邻的东胡人相联合。在历史上再次失去山戎之称。而到北朝、隋唐、五代、辽金之时又以商代之名“奚”而出现。唐代末期，由于契丹的强盛，它征服了包括大部分奚人在内的同邻各族。到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先与契丹融合，后又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金人入关破燕，著名的奚族人回离保，曾以奚族立国，公元1123年8月，又被金将郭药师所灭，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山戎族从夏代至金，大约存在了三千多年，可以说它在我国的民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山戎人的生活习俗对中原大地及古代北京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首先，山戎人对太阳的崇拜和覆面习俗影响至深。从发掘的山戎墓葬中我们发现，山戎人的墓地都选在向阳的坡地上，墓坑的排列一律作东西方向，人体均为头东足西或头偏东南而足偏西北。即使有的墓地设在低山东侧，而墓主人的头皆向东朝阳。山戎人杀牲殉葬的习俗也是如此，他们虽然仅用一只牲畜的腿和一个头，代表一头牲畜，作象征性殉祭，但殉牲不是随便放置，而是集中陈置在墓的东端，有的墓殉牲的牛、马、羊尽管多达几十个头和几十条腿，但牲畜的吻部却一律朝向东方，这是因为山戎人尊崇太阳，他们的牧猎生活对太阳有特殊的依赖关系。

山戎人覆面的葬俗习惯主要表现为，不论男女老少和儿童，都用麻布一类的纺织物覆面巾，其巾上还缀着小铜扣作为装饰，盖在死者的脸上。覆面的意义，据有关民族资料分析，是为让死者的灵魂永远安息，使活着的本氏族人永远平安。

山戎人尚日的习俗对契丹人的影响极为深刻。契丹人住的车帐、房屋都是向东而设，今天北京地区遗留的辽代建筑，如大觉寺、云居寺、戒台寺等，它们与北京地区的其他古建筑坐北朝南截然不同，均为朝东方向。山戎人覆面习俗的影响对北京部分地区最为突出。在北京的北部地区，人死后，也用白布盖脸或盖其全身，身下铺着黄布，叫做“铺金盖银”。其意义虽不像山戎族覆面为祈望死者不再灵魂出窍，去侵害别人，但也是为了死后不让活着的人看其脸，而日后感到恐惧或有不吉祥之感。

其次，山戎的娱乐习俗对后人的影响现仍可见。如打秋千活动，即创建于山戎族。据《日下旧闻考》中说：“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捷者。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秋千。”至今在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朝鲜族）的学校、幼儿园或公园里仍有秋千及秋千式的荡船存在，是人们锻炼、娱乐中不可缺少的项目。

综上所述，山戎族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影响深，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山戎族几个问题研究的情况

张秀荣

山戎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从文献记载来看，它的历史很悠久，《史记·五帝本纪》云：尧舜之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逸周书·王会解》亦云周初北方有山戎。《史记·匈奴列传》也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可见山戎确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又是一个以“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的游牧民族（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早在商周乃至春秋战国之际，山戎就与沙貉、蒿离、孤竹、肃慎等族，共同混居于燕山南北，而山戎在这些民族中势力最大。他大约存在三千年左右，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到最后部分地融合于其它民族，部分地逃向蒙古草原，至少也有二千多年，可以说山戎族在我国的民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确实很有必要。

其实，在解放前史学者们对山戎的研究就已经开始。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于解放前曾编著《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书中专意收集和研究所“绥远青铜器”资料，该资料中有一部分是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山戎文化遗存资料，因当时囿于资料的缺乏，未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可喜的是在解放后，从50年代至70年代在我国河北省北部和西北部的承德市、平泉县、宣化、青龙、丰宁等16个市县内，皆征集到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资料，或发现有此类文化的墓葬。在80年代，又在河北宣化县、北京市延庆县等地发掘了含有同类文化的遗址（《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记略》，《文物》1989年8期；《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这为研究山戎民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现将对该民族研究的状况略作以下介绍。

1、山戎族的发源地问题

关于山戎族的发源地问题，目前史学界有不同意见。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最初是生活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在今河北蔚县、灵丘等地，近年来，在北京北部地区的延庆及河北滦平、隆化、青龙等地发现的由戎墓葬和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人不断东迁时，部分地留在该地的境内，而山戎的主体部分继续东迁之后，就居住在今河北玉田县西北的无终山，因此，山戎又被称谓无终山戎。（王玲：《北京历史发展与延庆的文物特点》，《北京史研究通讯》总第23期）山戎人的发源地究竟在何处，至今还未有明确答案，仍然需要继续再探讨、研究的问题，但总的说来，山戎人行山居，以山林狩猎、高山放牧为生，长期生活在北方，又在山中生活，固然，中原华族当时称北方的民族为“戎”，因

而称这一支为山戎族。（王玲：《北京历史发展与延庆的文物特点》，同上）。另外，古文献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戎是属于“山间之民”，《左传》文公13年这样记载：“戎伐楚”，杜预为之注释说：“戎，山戎也”，孔颖达为它注疏云：“戎是山间之民”。依据这种解释，活动在燕国附近的山戎，我们认为他可能也是“山间之民”，这个山应该指的是“燕山”，这种说法与山戎所活动的地理情况比较一致，因此说山戎属山间之民与实际情况相符不悖。（王采枚：《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北京史论文集》）

2、山戎与东胡是否为同一族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

关于历史上的山戎与东胡是否为同一族，学术界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意见分歧，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本为一族，只不过是称谓的先后不同而已，先称为山戎，而后谓东胡的，因此认为“称他（指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和东胡的前身山戎的遗存是妥当的”（刘观民、徐光翼：《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10日）。那么，历史上的山戎与东胡究竟是同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是否是先称为山戎，后来又称谓东胡？靳枫毅先生依据历史文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靳先生认为这些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族，每一个名称，都是“自有君长”、“莫能相一”，各自独立的民族而并列的，并不是作为一族异称进行重复罗列的。他还列举《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东北方有稷慎、发、东胡、山戎……”这里的几个民族的每一个名称，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并列的，而不是当作一族异称重复罗列的（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2期）。

为进一步说明山戎与东胡是两个独立的民族，不存在先称山戎而后谓东胡这个问题，靳先生还从他们所处的地理方位上进行了分析，通过参见《史记·匈奴列传》、《赵世家》、《齐世家》、《国语·齐语》等历史文献，最后分析得出山戎的地理方位，应在东胡的南面，距燕与齐比较近的一些地域内，而东胡比山戎更为偏北，是在距匈奴的东界及赵的东北边防较近的一些地域内，最终得出“它们本是两个各有自身活动地域的不同的民族”及同时存在的民族（同上）。

关于对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属山戎的遗存，还是属东胡的遗存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山戎的遗存，不是东胡的遗存，其理由为“东胡到战国时代”才出现的，并认为若把辽西地区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与东胡挂钩，是历史的一种误会，因为努鲁儿虎山以东广大地区，是所谓东北系铜剑的主要分布区，这“应是涉貊（包括高句丽、夫余等）、真番、朝鲜等族的祖先所共有的一种遗物。”（王采枚：《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北京史论文集》；林云：《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2期）靳枫毅先生又从考古学方面进行考察与分析了山戎和东胡文化分布的地域及文化特征，考察结果表明代表山戎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遗存多见于冀北自七老图山至滦河流域、燕山、军都山一带地区，而很少发现代表东胡文化的曲刃青铜短剑，滦河流域等地区的山戎文化面貌与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地望上看，冀北自七老图山到滦河流域及燕山和军都山一带是山戎族的居住地。山戎在楼烦、林胡的东面，北面与东胡搭界，南面又与燕国为近邻，所以，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山戎“伐燕”及“病燕”乃至跨过黄河去“伐齐”的事件。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在山戎的北面。靳先生认为“冀北的文化遗存是山戎文化遗存，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骨，应为东胡人的遗骨”（靳枫毅：《夏

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2期；《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下），《考古学报》1983年1期）。

对山戎族的研究虽然在解放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但仅仅是收集一些资料，真正展开对他诸问题进行研究，也只是近十几年来事，因此，有关他的专著及专题论文还比较少，不过戎族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势力较大的民族，他对我国的北方少数民族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的历史也是北京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史学界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民族。

夏商时期的氏羌

陈连开

中国西部地带的羌,古为泛称。商代的羌实指商以西西部所有各部;周出于商人眼中的羌,且与羌姓世为婚姻,讳言羌,故称西部与之为敌者为戎,周金文及古文献可以证明这个判断;秦以后又恢复氏羌的称号,所指与商代大有区别;今之羌族,与古羌人有很深渊源联系,但不能划等号,将古羌人作为族群则可,作为一个民族则不可,此为中国民族史所不可不加以辨别的,这里试作叙述如下。

一 氏羌的起源

氏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联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蜎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羌。《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①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②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③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④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首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⑤即使姬姓,也有骠戎和犬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婚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氏)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愬,灵愬生互(氏)人”。氏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自九州之戎或西羌。据考证,^⑥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其往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氏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⑦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氏羌与炎黄的渊源联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有共同的渊源。早于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